DOI:10.20270/j.cnki.1674-117X.2026.5008

青年“数字交往狂欢”的异化表征、成因解构与纠偏路径

邹佰峰，王英华

（东北林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摘要：数字技术的深度渗透重塑了青年精神交往的场域，青年“数字交往狂欢”作为数字时代精神交往的典型形态，本应承载马克思所强调的“思想、观念、经验深度交换”的本真功能，却在资本逻辑、技术理性、青年认知局限与社会支持缺位的交织作用下逐渐异化。对此，应以马克思精神交往思想、异化理论为核心根基，结合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与青年发展规律，系统梳理青年“数字交往狂欢”在交往内容、关系、主体、需求四个维度的异化表征，从资本逐利、技术僭越、个体认知、社会支持四维解构异化成因，并提出“理论筑基—技术规制—教育赋能—社会协同”的递进式纠偏路径。研究揭示，数字时代青年精神交往异化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在精神领域的异化”，其纠偏需回归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旨归，通过多维度协同实现精神交往的理性复归，为引导青年重构健康数字精神生活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关键词：青年；数字交往狂欢；异化表征；成因解构；纠偏路径

中图分类号：B03；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26)05-0066-08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逐渐迈入“数字生存”的新阶段，互联网、社交媒体以及智能算法等技术形态重构着青年的日常生活图景，使青年精神交往的内核与范式发生深度变革。由此，青年“数字交往狂欢”应运而生并成为青年群体在数字空间中开展精神交往的主导形态。数字交往狂欢以即时互动、情感共鸣与集体参与为核心特征，涵盖网络热梗传播、话题讨论、沉浸式娱乐等多元形式，本质上是具有数字身份的青年主体在数智空间开展的精神交往活动，本应遵循交往理性原则，成为青年释放情感、交流思想、构建身份认同的重要载体，在互动中完成思想认知、价值观念、情感意志与文明文化的信息交换传递，契合精神交往满足主体精神需求的本真内涵[1]，但随着数字技术同资本逻辑的深度绑定，其逐渐偏离精神交往的本质轨道并呈现出内容虚无、关系物化与主体迷失等显著异化倾向。一些青年沉溺在狂欢式的碎片化信息之中，渐渐失去对深层次内容的理解力，只把交往关系当作一种数字数值互换的形式，从而违背了“主体—主体”的平等交流原则，沦为了算法操控下的“流量机器”。他们把享乐式的即时快感等价于精神需要的供给，背离了“精神解放”的初衷。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2]165 这揭示了精神交往和物质劳动之间的内在联系，为我们在这个数字时代反思青年精神交往

收稿日期：2026-03-23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中国特质研究”（24KSB013）

作者简介：邹佰峰，男，黑龙江哈尔滨人，东北林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异化现象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数字时代中青年的交往异化已经成为限制其全面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剖析其异化的表征与成因，并在实践中构建起系统性的纠偏框架。

一、青年“数字交往狂欢”的异化表征

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自主活动、自由活动”是人的类生活的核心体现，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本质特征，这种活动本应服务于人的精神成长、情感满足与自我实现，是目的本身而非外在手段。数字交往狂欢的异化，恰恰复刻了这种“手段化”的异化逻辑，青年本应自由自主的精神交往活动，即思想碰撞、情感共鸣、价值建构的类生活实践，却在资本逐利与技术操控的双重作用下，逐渐丧失了自主性与目的性。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深入剖析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现象时深刻指出：“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3] 这一论断不仅精准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异化对人的类本质的扭曲，更具有跨越时代的理论穿透力，其核心要义同样深刻适用于数字时代青年“数字交往狂欢”的异化现象。

（一）交往内容虚无化：从深度对话到符号堆砌

精神交往的本质是思想、观念及经验之间深层次的思想交流，它应该具有结构性和价值性，能促进人们的精神发展。但在青年群体数字交往狂欢里，交往的内容却呈现虚无化的特点，其集中体现为两方面：一是内容碎片化的倾向十分明显。数字技术带来的快捷性和即时性让青年更加倾向于获取与转发一些短平快的信息，比如缺乏逻辑关系的互联网流行语、浅尝辄止的娱乐视频片段，甚至是零散的观点议论等等，都成为了狂欢的主流内容。它们不需要复杂的思考过程，只需要简单的即时情绪，长此以往青年就逐渐失去了对于复杂观念和理论体系的吸纳及传播能力，精神上的交流最终沦为一堆碎片信息的堆砌。数字化媒介所带来的信息浅层化的结果，在数字交往狂欢中表现尤为明显，碎片化的实质就是精神交流的失序，青年不但不能通过这种狂欢来进行深度的思想碰撞，相反还会陷入到碎片化的信息漩涡当中，逐步滑向片面追求娱乐享乐的单向度状态，既消解了深度理性思考能力，也造成了意义、价值与理想的总体性失落，背离了精神交往促进认知深化的本真价值[4]。二是价值功利化的趋向明显。在资本的驱使之下，“流量”“热度”成为数字狂欢活动中的主导因素，而精神的价值却沦为次要角色。一部分青年人为了博取眼球故意营造噱头或是低俗话题，平台为了提高用户的留存率也频繁发送一些传播度高但是价值较低的内容，出现了“为了狂欢而狂欢”的局面，这些内容缺乏思想和情感价值，单纯把吸引关注当作交往的目标，这种功利性使得精神交流的价值性逐渐消失殆尽，青年不仅无法在这种狂欢活动中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反而会被“流量至上”的错误价值观所引导，形成“重热度、轻价值”的交往取向。这种功利化的交往取向，本质是资本扩张逻辑向数字精神交往领域的深度渗透，资本逻辑将流量增殖作为衡量内容价值的核心标尺，推动符号消费逐步取代精神价值消费，既是日常生活空间资本化在数字场域的延伸，也深刻反映出资本对青年精神领域的侵蚀，助推了消费主义文化在青年群体中的扩散[5]。

（二）交往关系物化：从主体互动到数字交易

精神交往是“主体—主体”间的平等互动关系，其以人的情感与思想作为联结纽带，并且体现出人的社会性本质。青年在数字交往的狂欢场景里，彼此间的交往关系逐渐显现出物化的特征，这类物化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系符号化的表现明显。数字技术把青年的交往行为转变成能够被量化的数字符号，点赞、关注、转发、评论数等内容成为评判交往关系的核心依据，身处狂欢氛围中的青年不再留意交往对象的思想与情感，反而依靠数字符号的数量判定交往关系的远近以及交往行为的价值，部分青年还会做出刷赞、买粉等行为，直接把交往关系变成数字商品的交易。这种符号化的交往本质上是交往关系人性化内涵的消解：青年的情感、需求等生命因素经数字化处理被抽象为可量化、可交易的数字符号，个体精神交往逐步沦为服务于资本增殖的改造对象，交往行为不断向表演化、表层化滑落，既

消解了真诚的情感联结与深度的思想交流，也背离了精神交往“主体—主体”的平等互动范式，是符号拜物教对精神交往领域的深度侵蚀[6]。二是主体间性存在明显缺失，主体间性是精神交往的核心属性，这一属性强调交往双方开展平等对话以及进行真诚互动。在数字交往狂欢中，算法推荐技术催生的信息茧房使青年只能接触到和自身观点相符的内容，青年渐渐失去和不同观点展开对话的能力，集体狂欢自带的群体无意识特征致使青年盲目追随他人并且复制他人观点，缺少独立思考与自主表达的意识，交往行为也就沦为假性互动。这种主体间性的缺失让青年无法在狂欢过程中实现真诚的思想交流，交往关系变成单向度的信息传递，失去精神交往的双向互动特征。数字场域中技术规则不断挤占平等对话的交往空间，技术理性持续压制以符号互动、双向协商为核心的交往理性，技术统治将本该依靠主体对话解决的交往问题简化为算法、工具层面的技术管控，该失衡状态在数字交往狂欢中广泛存在[7]，从而深刻影响精神交往的质量与深度。

（三）交往主体迷失：从主动建构到被动受控

人是实践的主体并具有主观能动性，精神交往是人的主动建构过程，但在数字交往狂欢里，交往主体却逐渐呈现迷失状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8] 主体迷失恰恰让青年丢失这类进取姿态。其一，自我判断能力弱化，集体狂欢带来的群体效应使得青年容易丧失理性辨别能力，青年因此盲目跟随群体行为以及认同群体观点，且参与非理性网络论战以及传播不实信息。这种“群体无意识”本质上是青年自我判断能力的丧失，青年不再以自身的理性与价值观为判断标准，而是以群体行为为导向，沦为群体意志的追随者，背离人的主体性原则。数字平台用热搜榜单、话题挑战等形式刻意营造集体氛围，进一步诱导青年放弃独立思考，从而加剧主体迷失。青年群体本身情绪热烈、思想尚未完全定型，极易受到外部环境与群体思潮的裹挟，这一先天特质在数字狂欢的流量氛围、群体氛围助推下被持续放大，极易消解青年独立判断、理性思辨的自觉意识[9]，最终造成个体理性判断能力的持续弱化。其二，算法操控下的被动性凸显，算法推荐技术是为用户提供个性化内容的工具，却在资本逻辑驱动下成为操控青年数字交往狂欢的核心手段，平台分析青年的浏览记录以及互动行为，精准推送高黏性狂欢内容，刺激青年持续参与。平台还通过信息茧房、上瘾机制等手段将青年固定在特定狂欢场景中，青年从数字交往的主体变成算法喂养的对象。这种被动性是青年交往自主性的丧失，青年无法自主挑选狂欢内容以及管控狂欢时间，从而被算法操控，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

（四）交往需求错位：从精神解放到即时快感

青年的精神需求应当指向精神解放与自我实现，精神交往则是满足该需求的重要途径，但在数字交往狂欢中，交往需求逐渐呈现错位特征，其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需求浅层化。青年在狂欢中将即时娱乐快感等同于精神需求的满足，因而忽视了知识积累、思想成长、情感升华等深层追求。他们沉迷于短视频带来的瞬时快乐，故而不再花费时间阅读经典、参与深度对话；热衷于网络热梗的传播，所以不愿思考热梗背后的社会意义。这种浅层化是青年精神需求层次的降低，青年无法通过狂欢实现精神层面的突破，反而被即时快感裹挟，最终形成“重娱乐、轻成长”的需求取向。娱乐化会消解深度思考的警示在数字交往狂欢中得到了充分印证，青年精神生活的浅层化已成为突出问题。其二，需求逃避化。部分青年因现实生活中的学业压力、就业焦虑、现实交往不足等问题，将数字交往狂欢作为逃避现实的“精神避难所”。在狂欢中暂时忘却现实困境，获得短暂的情感宣泄，但这种宣泄并非建设性的精神调节，而是消极的现实逃避。部分青年身上甚至出现沉迷数字狂欢、拒绝现实的现象，他们将数字狂欢作为精神生活的全部，丧失面对现实、解决问题的勇气。这种逃避化本质上是青年精神需求导向的扭曲，需求从主动的自我实现异化为被动的困境逃避。现实生活中稳定、深刻的精神交往渠道存在供给缺口，青年转而依托虚拟数字场景获取代偿式情感慰藉，而长期沉浸算法塑造的同质化虚拟互动，又会逐步消磨个体经营现实人际关系的耐心与动力，持续加深青年对数字交往模式的心理依赖，二者相互助推、往复强化，形成难以挣脱的闭环矛盾[10]。

二、青年“数字交往狂欢”异化的成因解构

青年“数字交往狂欢”的异化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复杂结果，其根源深植于现代数字社会的结构之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剖析资本本质时明确指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11]这一论断精准戳破了资本逐利的内在逻辑，其增殖诉求具有无边界的扩张性。在数字时代，这种资本逻辑与技术理性的合谋，加之青年自身认知局限与社会支持体系的相对缺位，共同构成了异化的结构性成因。资本将青年的数字交往狂欢转化为新的增殖场域，技术则提供了精密的操控工具，而青年主体能力的不足与社会培育体系的偏差，使得这种异化得以渗透并固化。

（一）资本逻辑驱动：数字逐利下的狂欢异化

资本逻辑是青年数字交往狂欢异化的核心动因，数字资本主义的逐利本性将青年精神交往纳入资本增殖链条，具体通过两个路径实现。一是平台资本的流量至上逻辑。数字平台作为资本的载体，其核心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而流量是利润的直接来源。为获取流量，平台通过设计热搜榜单、话题挑战、虚拟勋章等狂欢场景刺激青年参与，将青年的精神交往转化为可量化的流量数据。同时通过广告投放、数据变现等方式将流量转化为利润，使青年数字交往狂欢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这种逻辑本质上是资本对精神领域的渗透，青年的精神交往不再以自身需求为导向，而是以资本增殖为目标，导致狂欢内容与形式均围绕流量展开，丧失核心精神价值，形成精神交往产品的异化。“数字资本扩展表现出‘脱域性’特点，并从经济领域向意识形态领域渗透”[12]，精神领域已成为资本增殖的重要场域。二是符号消费的异化引导。在数字时代，资本通过将数字交往狂欢符号化，进一步加剧交往关系的物化。资本将参与特定狂欢、拥有特定数字符号转化为身份认同的象征，诱导青年为获取符号价值参与狂欢。部分青年甚至把数字狂欢中的人气、热度转化为社会地位的象征，因而将数字符号的积累当作自身价值的实现。这种符号消费是资本对青年价值观的误导，让他们慢慢把符号价值等同于精神价值，交往关系也就沦为符号交易，背离精神交往应基于人的本质需求的基本准则。

（二）技术理性僭越：算法操控下的交往失序

技术理性的僭越是青年数字交往狂欢异化的重要原因，数字技术的工具理性剥夺了价值理性，造成精神交往失序。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13]技术的发展要坚守底线，技术理性的僭越恰恰突破了这一底线。算法的效率优先取向是数字技术工具理性的核心体现，算法作为数字技术的核心，以“效率至上”的工具理性为准则，以最小的成本追求最大的效果。这就使得算法忽略了对青年精神成长的需求，只注重“怎样才能让青年不断沉迷狂欢”，用信息茧房推送青年感兴趣的资讯，限制青年接触到多样化深层次的信息，在上瘾机制的作用下驱使青年不断沉迷，却不顾他们的时间消耗以及精神压力。这实质是技术理性对于价值理性的压制，算法把青年当作达到效率的目标对象而不是需要精神发展的个体，使青年处于狂欢之时被迫接受操控并失去自我主体意识。数字时代技术异化的逻辑呈现出崭新形态，“技术理性越发达，人类对算法依赖程度越高，这种依赖可能会湮灭主体理性，将人类从主导者与主体的角色退化为顺从者与客体的角色，被迫接收技术理性的组织和操控，沦为数据的生产机器”[14]。数字媒介的感官刺激强化是精神交往异化的重要推手，数字媒介设计围绕强感官刺激展开，它运用视觉与听觉的直观感受来吸引青年目光，因此渐渐削弱其深度思考能力。短视频采用快速切换镜头与高分贝的画面持续给青年以感官上的刺激，让他们在短时间内产生强烈的情绪共鸣，这样的情绪共鸣具有瞬间性和肤浅性，不利于青年思想层面的成长；直播以即时交流和礼物打赏的方式营造出狂欢的场景，诱导青年沉浸在即时快感之中，从而忽视了精神交往的深层意义。媒介技术通过这种感官刺激强化，将精神交往转变为依靠感官刺激支撑的娱乐活动，使得青年逐渐丧失对系统性理论与深度思想的追求。

（三）青年认知局限：主体能力与精神需求的失衡

青年自身认识的局限是数字交往狂欢异化的内在动因，青年自身数字素养、精神需要方面的认识不足易使其陷入异化困境。其一，现实中精神交往供给不足和质量参差不齐。青年在现实生活中面临巨大的学业竞争、就业压力以及流动加速带来的社会关系的变化，这些都挤压了青年进行深层次、高质量的精神交往所需要的时间与心理空间，现实中深层次的精神交往要求共在的空间、持续的投入、较高的情感和认知成本，在快节奏、高绩效的生活环境下，这样的精神交流方式显得过于“低效”且充满不确定性。反观数字交往狂欢以异步实时、低成本与高感官回馈的优势为他们带来方便快捷的情感释放与初步联系，从而产生替代性吸引力；另外，制度化支持系统存在失衡现象，学校教育注重知识的教学，忽视对学生精神交往能力的培养，背离了教育应该使人得到全面发展这一理念；社会环境缺少良好的、非功利性的公共精神交流场所及指引，青年难以找到深度对话与思想交流的平台，违背了青年成长所需要的社会环境条件要求。高质量现实精神交往的“供给不足”与“获取不便”，促使青年向数字空间寻找当下的精神救济与联结体验，把数字狂欢当作重要的精神交往形式。然而数字空间的独特性导致狂欢极易被资本力量和技术理性左右，在缺少健全而深刻的实际交往作为对比参照物的基础上，青年容易被狂欢的异化特质所迷惑而不断陷入“现实缺失——数字化沉迷”的恶性循环之中。现实多重焦虑推动青年主动规避现实人际往来，数智技术低门槛供给搭建起低成本、高感官回馈的线上情感宣泄渠道，长期沉溺技术制造的即时感官刺激，会让青年逐步丧失把控技术的主体性。双重因素叠加持续加深青年对数字交往狂欢的心理依附，最终催生交往层面的各类异化问题[1]。其二，数字素养与理性思维薄弱。青年的数字素养仍停留在技术操作层面，缺乏对数字伦理、算法逻辑、精神交往伦理的系统认知。青年不了解算法的操控机制，易被算法推送的狂欢内容裹挟，不具备辨别数字信息的能力，易接收、传播无价值的狂欢内容，不理解精神交往的本真内涵，易将数字狂欢等同于精神交往。同时，青年的理性思维能力不足，易受群体无意识、即时快感的影响，在狂欢中放弃独立思考、盲目参与。这种薄弱本质上是青年理性志趣的缺失，青年无法以理性为指导开展数字精神交往，易陷入异化困境。青年数字素养与理性思维的不足，使其在数字空间中缺乏足够的主体性与判断力，难以抵御资本与技术的异化影响。

（四）社会支持缺位：培育体系与文化导向的偏差

社会支持体系的缺位是数字交往狂欢异化的外在动因。当下，家庭、学校、社会文化的导向存在偏差，未能为青年提供健康的数字精神交往环境，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家庭引导的弱化。家庭作为青年成长的基础环境，在青年数字精神生活引导方面存在不足。部分家庭忽视青年的数字生活，对数字交往狂欢的异化特征缺乏认知，未能及时提醒与干预，违背家庭应承担的教育功能。部分家庭采取过度限制的方式，禁止青年参与数字狂欢，引发青年逆反心理，不符合教育应遵循青年发展规律的要求。家庭引导的弱化使青年在数字精神生活中缺乏价值指引，易陷入异化困境。二是学校教育的偏差。学校的数字素养教育多聚焦技术操作，忽视数字伦理、算法认知、精神交往伦理的培育，违背教育应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精神培育侧重意识形态灌输，缺乏对精神交往思想的系统阐释，青年难以理解精神交往的本真内涵，无法以理论指导数字交往实践。学校教育的偏差使青年的数字素养与精神培育脱节，无法形成“技术操作——理性认知——精神成长”的完整能力体系，易在数字狂欢中迷失方向。三是社会文化的导向失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15] 社会文化的导向直接影响青年精神生活质量。社会层面对流量文化、娱乐文化的过度推崇，弱化了优质精神文化的传播，导致青年缺乏健康的交往内容参照。主流媒体对数字狂欢的报道多聚焦热度，忽视精神价值的引导，违背精神生产应服务于人的发展的原则。文化平台对优质精神产品的扶持不足，青年难以接触到具有思想深度的数字内容，不符合精神交往对优质内容供给的要求。社会文化的导向失衡使得“流量至上”的思想成为数字空间的主导思想，青年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易被误导，形成“重娱乐、轻价值”的交往取向。社会文化对流量与娱乐的过度追捧，为青年数字交往狂欢的异化提供了土壤。

三、青年“数字交往狂欢”异化的纠偏路径

青年“数字交往狂欢”的异化，本质上是精神交往与现实实践、主体性与客体性相割裂的体现。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2]151 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精神交往的现实性、具体性与主体间性本质。因此，纠偏的根本遵循在于回归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与“精神交往”的理论本真，其核心理念是通过扬弃异化，重建数字空间中平等、理性、深入的精神对话。

（一）理论筑基：重塑精神交往的价值导向

理论筑基是纠偏青年数字交往狂欢异化的根本前提，核心在于以马克思主义精神交往理论为基础，重构数字交往的价值框架。为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需设计可感知、可参与的具象化方案。具体而言，可从内容创新与行为激励两个维度展开操作。内容维度要着力开发理论穿透系列数字产品并推动经典理论的场景化传播，可系统制作“马克思遇见数字时代”系列轻量化内容，策划以“商品拜物教的数字化身”为主题的短视频，在三分钟内剖析流量数据以及虚拟礼物如何演变为新型崇拜符号，同时开发名为“我的数字交往诊断”的互动 H5 应用，引导用户回溯自己的点赞、评论记录，生成自己交往模式的异化指数可视化报告，并且关联推荐《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相关节选与解读。行为激励维度要创设价值锚点线上实践，在主流社交平台发起数字交往价值共创长期计划，设立“交往理性实践”等专属话题并配套设计相应激励与展示机制，平台每月评选“金茧房突破奖”，奖励那些在热点事件中能引入多元信源、进行理性辨析的原创深度内容，同时给予其流量加权与首页展示。同时，可联合高校图书馆、人文社科类社团，经作者同意后将线上优质深度发言收录至青年网络思想年鉴，并赋予相应的学术认可积分，从而将线上深度交往转化为可积累的符号资本，引导交往取向从“求赞”向“求真”“求深”迁移。

（二）技术规制：重构平台的运行逻辑

技术规制是纠偏青年数字交往狂欢异化的重要一环，其根本是要回到技术为人的解放而存在的初心，重塑人与技术共存之道。具体实施需要双管齐下，即在可量化的监管与可感知的赋权两个方面同步进行。一是要确立并严格执行“信息生态环境健康水平”的刚性监督标尺。这就需要监管部门携手相关领域的技术伦理专家，共同建立包含以下几项量化指标的量化指标体系：如无价值信息占比、观点丰富度指标以及青年深度交流指数等。网站平台必须定期出具经过审计的环境健康状况报告，“无价值信息占比”要明确界定并设定逐年下降的具体指标，“观点丰富度指标”也必须在重大时政新闻信息流中设定相应的下限，从根本上用技术指标来打破信息茧房。二是要在算法设计及产品功能上进行价值理性的工程化植入。在算法上必须要强制推行推荐系统的复式优化，在模型训练中的损失函数里把内容的信息熵值以及观点冲突度纳入和用户滞留时间、点击率相同的地位的硬性优化目标。技术端上可通过引入基于 Transformer 结构的大规模预训练模型来对文本、视频字幕做深层次的理解，从而自动辨识出含有完整论证逻辑链条、有可靠来源出处、包含对立面的观点等内容，给予初步排序优先权级。在产品设计与用户交互上也要给予直接的算法干预手段。比如应用程序端设置“信息营养均衡器”调节按钮，允许用户自由设定信息流的比例；并且开发“知识加油站”，当系统发现用户长时间沉迷于单一类型的信息流之中就会强行推送一些高质量的知识性内容对用户的注意力进行技术性中断，使其重新获得选择的权利，达到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重融合，确保技术能够真正服务于青年的精神培育之路。

（三）教育赋能：强化青年的主体能力

教育赋能是纠偏青年数字交往狂欢异化的根本措施，其要旨在于以创造性教育改革培养青年批判精神、理性对话的能力；关键在于制定出能够同娱乐化产品争夺青年注意力的具体方案，把被动的防御性批判意识转变为主动性的创造和参与。一是提升数字素养教育要从知识型课堂向体验型课堂转变，例如

在学校和社区广泛开展“算法思维和社会”的讲座，组织学生使用公开的数据源和简单的编程语言，让他们亲自完成一次“信息茧房模拟实验”或者训练一个“偏见检测模型”，让学生从算法的设计者角度来理解其背后的操控机制，进而破除对技术黑箱的迷信，建立起对技术批判的底层认知框架。二是要加强青年的精神文化培育，营造具有高互动性与社会激励性的“线上思想市场”。为有效吸引注意力，需教育系统、传统媒介、新媒体三方合力搭建出国家级青年思想传播品牌工程，如定期开展“网络热点辩论赛”“深度调查研究征文比赛”等。活动以学生擅长的和喜欢的方式进行，比如短视频、音频、长图文等，并配套提供资金扶持、专家指导、全媒体展示等实际奖励，使理性分析和公共发言成为一种值得被广泛赞誉的新型社交资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青年要肩负历史使命，坚定前进信心，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16] 通过双管齐下的路径把理论认知转化为实践创造的过程，才能使教育赋能真正地帮助青年在数字交往中进行精神上的重塑。“构建全面的数字素养培育课程体系”[17]，其意义就在于青年能够在纷繁复杂的数字世界里主动去寻找价值、建构主体性的自觉实践。

（四）社会协同：构建多维支持体系

社会协同是纠偏青年数字交往狂欢异化的保障条件，其有效性在于是否能够形成一个承认并补足各方能力缺陷、有标准支持工具的社会网络体系。具体落实要围绕家庭赋能和优质的资源供给这两条工程化的路径展开。针对家长数字素养普遍缺失的主要瓶颈，必须把抽象责任具象化成低门槛、强渗透性的“服务”。需要由地市级教育行政部门牵头研发统一标准、易于理解的家庭教育资源包，内容要极其细化，比如制作出分年龄段可以直接签署的《家庭数码产品使用协议书》模板，列出能有效检测孩子是否有沉迷网瘾的症状清单，准备几套应对不同矛盾情景的角色扮演脚本。核心工作机制在于必须要将这一资源包纳入到学校既有强制管理制度中去，可以在每学期家长会在线签到时强制要求家长阅读并作答，或者学习“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的做法，定时下发一定数量的必须由家长、学生一起完成的三分钟左右的小视频、问卷等，做到全覆盖的认知唤醒。在社会文化供给方面，开展优质产品的规模化生产和穿透算法分发的对接工程。宣传文化和广电部门要设立专项资金，扶持一批兼具深度和网感的文化作品的创作，如人文社科类短片，经典文献互动答题小游戏等等。方案落实的关键在于要与一些主要的内容供应商进行制度性的合作，通过开通“精品专区”，或者是对经过认证的优质内容给予推荐算法中一定的初始分值等方式，让这些内容能够突破娱乐信息的流量壁垒从而获得精准触达的机会。只有将家庭支持工具化和流程化、将优质供给对接到主流分发渠道，才能建立一个坚强的社会支持体系，确保青年数字精神世界健康发展，最终引领数字狂欢回归价值本真。

概言之，青年“数字交往狂欢”的异化，其本质上是马克思所批判的“人的本质的异化”在数字时代的新形态。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劳动产品异化”到数字时代的“精神交往异化”，资本逻辑与技术理性的合谋，导致青年在狂欢中失去了“自由自觉活动”的本质力量，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旨归。然而，正如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预言：“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18] 数字时代的纠偏，正是为了通向这一“自由个性”的阶段——青年在数字精神交往中既能享受技术带来的便利，又能坚守精神交往的本真，实现“数字技术为人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技术观。通过理论筑基锚定本真、技术规制约束异化、教育赋能唤醒主体、社会协同重构生态，我们方能引导青年在数字狂欢中保持“清醒的狂欢”，即既不排斥数字技术，也不被技术与资本操控，始终以马克思精神交往思想为指引，追求“思想、情感、价值的深度交换”。这不仅是青年个体的精神救赎，更是数字时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当青年能够在“点赞”与“思考”、“热梗”与“真理”之间保持辩证的张力，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设想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422，终将在数字土壤中生根发芽，实现青年精神层面的解放与人类文明的进步。

参考文献：

[1] 胡德庆，廖小琴 . 对青年“数字精神狂欢”现象的重新审视与纠偏路径 [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33(9)：61-74，99.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M].3 版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 [M].2 版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74.
[4] 解兆丹 . 基于理性志趣的青年精神生活个性化 [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14)：116-119.
[5] 贺汉魂 . 资本扩张的逻辑及其防治之道：重温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思想 [J]. 海派经济学，2022(1)：1-18.
[6] 朱念念，王建红 . 当代青年数字交往中的异化现象及其消解 [J]. 领导科学论坛，2025(2)：97-100.
[7] 刘永谋 . 哈贝马斯对技术治理的批评及其启示 [J].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1(4)：48-54.
[8] 习近平 .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36.
[9] 黄陈晨，董大伟 . 理论·历史·实践：中国共产党青春特质的三重逻辑 [J]. 理论导刊，2023(2)：29-36.
[10] 冯刚，李晓静 .Z 世代虚拟情感交往的生成逻辑、潜在风险与优化路径：基于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审视 [J]. 中国青年研究，2026，38(2)：110-117，120.
[1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28.
[12] 温旭 . 数字资本主义下数字劳动的意识形态批判 [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9)：149-158.
[13] 习近平 .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34.
[14] 王锟，曹瑜 .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技术异化：生成逻辑·伦理审思·消解路径 [J].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4(4)：1-9.
[15] 习近平 .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0-41.
[16] 习近平 . 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论述综述（2020-2021）[M].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22：238.
[17] 吴砥，朱莎，王美倩 . 学生数字素养培育体系的一体化建构：挑战、原则与路径 [J]. 中国电化教育，2022，37(7)：43-49，63.
[1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

Alienated Manifestations, Cause Deconstruction and Correction Paths of Youth’s “Digital Communication Carnival”

ZOU Baifeng, WANG Yinghua

（School of Marxism,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Harbin 150040, China）

Abstract：The in-depth penet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has reshaped the field of youth’s spiritual communication. As a typical form of spiritual communication in the digital era, youth’s “digital communication carnival” is supposed to fulfill the intrinsic function of in-depth exchange of thoughts, ideas and experiences emphasized by Marx. However, it has been gradually alienated under the intertwined impacts of capitalist logic,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youth’s cognitive limitations and insufficient social support. To tackle this problem, this paper takes Marx’s thoughts on spiritual communication and alienation theory as the core foundation, combines the critical theory of digital capitalism and the laws of youth development, and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alienated manifestations of youth’s “digital communication carnival” from four dimensions: communication content, communication relations, communication subjects and communication demands. It deconstructs the causes of alienation from four perspectives including capital’s profit-seeking nature, technological usurpation, individual cognition and social support, and puts forward a progressive correction path of “theoretical foundation building-technical regulation-educational empowerment-social coordination”.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essence of alienation in youth’s spiritual communic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lies in “the alienation of human essence in the spiritual domain”. Its correction must return to Marx’s value pursuit of “the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Multi-dimensional coordination can realize the rational return of spiritual communication, which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guiding young people to reconstruct a sound digital spiritual life.

Keywords：youth; digital communication carnival; alienated manifestations; cause deconstruction; correction paths

责任编辑：陈璐